

王昌义 吴珉珉 著

中国大使手札

1991年3月，
以色列外交部总司长摩哈夫
对中国进行了不公开的访问。
4月，我作为中国外交部
西亚北非司司长应邀回访。
这是两国建交前
外交部官员之间的第一次互访。

中东 散记



东方出版中心

中国大使手札

王昌义 吴珉珉 著

中东 散记

东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东散记/王昌义,吴珉珉著.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2008.10

(中国大使手札)

ISBN 978-7-80186-885-5

I. 中… II. ①王…②吴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②中外关系—国际关系史—吉布提—现代—史料③中外关系—国际关系史—叙利亚—现代—史料④中外关系—国际关系史—以色列—现代—史料 IV. I25 D829.423
D829.3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45819 号

中东散记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 021-62417400

邮政编码: 20033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常熟新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20 毫米 1/16

字 数: 210 千

印 张: 13.75

插 页: 4

印 数: 0,001—6,350

版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186-885-5

定 价: 27.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 录

Contents

亲历中沙建交 / 1
中以建交漫漫路 / 10
中以官员第一次内部互访 / 18
万里撤公民 / 26
战火中的友谊 / 32
同阿拉法特在一起 / 37
穆巴拉克印象点滴 / 44
我所认识的阿萨德 / 48
永远的拉宾 / 58
忆魏茨曼 / 66
不倦的佩雷斯 / 74
直面巴夏尔 / 82
沙龙二三事 / 87
再次见到萨达姆 / 91
我与瓦迪的友谊 / 97
考夫曼和他的团队 / 102
东巴基和他的大马士革书店 / 109
中国恩人和犹太战友 / 112
德鲁兹人 / 118
女大使的生涯点滴 / 125
缘结叙利亚 / 131

难忘的钱行活动 / 138	138
吉布提生活片断 / 146	146
变化中的基布兹 / 152	152
不忘历史的民族 / 162	162
侧看以巴分歧 / 169	169
无处不在的犹太教 / 172	172
“大熔炉”、“镶嵌画”及其他 / 179	179
戈兰高地面面观 / 188	188
在以色列感受衣食住行 / 197	197
死海喜忧录 / 205	205
巴哈伊教花园 / 213	213

亲历中沙建交

三

1990年7月21日,中国同沙特建立外交关系。至此,中国同所有阿拉伯国家都建立了外交关系。这是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外交工作的一项新突破。

四

沙特位于西亚的阿拉伯半岛,地扼亚欧非三大洲的结合部。面积225万平方公里,人口2 000多万,是中东地区的大国。它盛产石油,素有“石油王国”之称,从储量、产量到出口量,都居世界第一位。它又是伊斯兰教的发祥地,在伊斯兰教的三大圣寺中,沙特占其二:麦加城的禁寺和麦地那城的先知寺,在伊斯兰世界影响很大。在中东乃至国际事务中,沙特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

早在1946年11月,沙特就同中国国民党政府建立了领事关系,互设了领事馆。1957年,沙特同台湾当局又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双方在政治、经济、军事、民航等领域都签订了一系列合作协定,保持了全面合作关系。中沙建交前,沙特是台湾在中东地区唯一保持“外交关系”的国家,也是台湾当局在海外重点经营的阵地。

三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同沙特的关系稳步发展,来往逐渐增加,相互了解和信任也在不断加深。

1988年7月,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致函钱其琛外长,正式提出两国互设商务代表处的建议。钱其琛复函表示同意,并认为中沙建交的时机已经成熟,双方应尽早建立正式关系。同年10月,两国外长在“联大”会议期间进行会晤。费萨尔重申,中沙合作将导致两国尽快建立正式关系。互设商务代表处只是走向全面外交关系的一个临时性步骤。希望在今后一二年内,两国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强调这是沙特的“最高承诺”。钱其琛也强调,商代处只是过渡性的临时措施,在一二年内应导致两国建交。

1988年11月,两国驻美国大使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署了互设商务代表处的谅解备忘录。1989年,两国商务代表分别赴任。商代处实际是半官方机构,享有一定的外交特权和豁免权。此事表明两国关系即将进入新时期。

四

1990年5月,沙特驻美国大使班达尔亲王非正式通报中国驻美大使朱启祜,沙特决定同中国建交,可能在近期内讨论具体事宜。

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美国等西方大国极力在国际上孤立中国。显然,无论从打开外交工作新局面,还是打破西方制裁看,中沙如果适时建交,意义重大,同时中沙建交对推动中国同沙特和阿拉伯世界关系的全面发展,对推动祖国统一大业有深远影响。

李鹏总理得悉后,当即指出,这是件大事,要抓紧,不失时机地进行。钱其琛外长也要求亚非司立即做好准备工作,对班达尔的通报作出积极反应。据此,外交部立即请朱大使告知班达尔亲王,中方认为两国建交条件已成熟,不存在任何困难,等待沙方提出正式建议,希望尽早在北京谈判。6月,班达尔又告知朱启祜,费萨尔外交大臣将致函钱其琛外长,通知沙方同中国建交的决定,并邀请钱外长访沙,共同宣布建交消息。他还说,他受委派将先到北京,初步商谈建交事务。中方答复他:随时准备在北京谈判。

7月9日至12日,班达尔到了北京。这是他第四次来北京。班达尔年轻能干,其父是前国王法赫德的同母弟弟、时任第二副首相兼国防大臣苏尔坦亲王。我们知道,沙特王国第一任国王阿卜杜拉·阿齐兹·沙特有个宠爱的妃子哈莎·苏黛里,她生了七个儿子,被称为“苏黛里七兄弟”。老大就是后来的法赫德国王,这七兄弟都担任要职。而班达尔又很受法赫德国王重用,1982年出任驻美国大使馆武官,次年升任驻美大使,直到2005年才离任回国。他已经三次访华,奉命处理沙、中之间的重要合作关系,当然,这次使命就更加重要。

双方会谈在钓鱼台国宾馆内进行。中方出面谈判的是杨福昌副外长。我也参加了会谈。我们的原则是,就一个中国的原则达成共识,沙特同我国建交后,对台湾就“断交、废约、撤馆”。这些原则都反映在建交公报和备忘录中。在具体的文字表述方面,尽量考虑沙方的接受程度。双方经过两轮谈判,就建交公报和谅解备忘录的内容达成原则协议。班达尔态度明确,表示沙特只承认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对中方提出的建交公报稿表示接受,只是要求不提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将其列入谅解备忘录。对中方准备的备忘录,班达尔表示基本同意,但提了一些非原则性的修改意见。他还一再开玩笑地说,这次建交公报和谅解备忘录不要百分之百地谈定,应该留点工作由双方外长去做。最后,双方商定钱外长于7月20日至22日访问沙特。

五

为确保钱外长访问成功,亚非司会同礼宾司、条法司、翻译室做了充分准备。关于公报和谅解备忘录,尽管双方已达成原则协议,但考虑到沙方可能出现的变化,我方也准备了另一个简短的公报。要坚持谅解备忘录的原则协议,但对备忘录中有关沙台军事合作、台在沙原馆舍等问题的表述,如沙方坚持去掉,可就一个中国问题达成共识后作出灵活处理。两份文件分别准备了中、英、阿三种语言的文本。从安全考虑,我们决定先乘中国民航班机至卡拉奇,在我国驻卡拉奇总领馆食宿后,次日晨再乘沙航班机赴利雅得。

我们通过双方的商务代表处曾多次讨论访问日程。在代表团离开北京前,沙方对钱外长访问日程安排并不详细,而且多次变化。19日晨,代表团离京时,只有一份框架性日程,其中22日白天的安排还是空白。此访的一项主要活动——签字仪式也未定下来。我商代处同志很着急,孙必干代表多次约见沙外交部亚洲司长、礼宾司长,对方未能答复我方关切的问题。此后,连两个司长也找不到了,只能同其礼宾司官员保持联络,对方更无回音。我们对沙方的办事程序和效率早有所闻,特别是那里事无巨细,都要报最高当局批准,因此,对这种状况也有思想准备。代表团19日中午抵达卡拉奇总领馆时,仍无关于日程的最新消息。下午,钱外长找我们将谈判方案和其他准备工作检查了一遍。钱外长问我,《人民日报》关于祝贺中沙建交的社论准备了没有?我说:他们已拟好,送给亚非司看过。他问:有没有提台湾问题?我说:考虑到沙对此很敏感,没有提,只是提到沙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他说:不提为好。夜里,我接到我们商代处的报告称,沙方安排20日下午双方外长举行第一次会谈,21日下午第二次会谈(原定只有21日上午会谈一次)。此外,沙方还补充了一些参观项目。

六

7月20日中午,我们乘沙航班机抵达利雅得。别看沙特到处都是大片大片的沙漠,但当我们飞抵利雅得上空时,却看见下面一座现代化城市耸立在绿洲中间。在我们飞越其他城市时,也都看到类似的景观。费萨尔外交大臣前来机场迎接,并陪车前往国宾馆。费萨尔是沙特第三任国王的儿子,当时国王法赫德的侄子,在王室中地位重要。他1975年即出任外交大臣,至今仍在任。他同钱其琛曾在纽约会晤过,这次见面,意义又非同寻常。他对钱其琛说,这是一次历史性访问。其父费萨尔国王在万隆会议期间同周恩来总理的会晤奠定了两国关系的基础,今天由他们来完成两国建交的伟大使命。钱其琛表示,中沙建交虽然晚了一些,但我们可加倍努力,将失去的时间补回来。当天下午,两国外长在正式会谈前举行了小范围会谈。费萨尔表示对公报和备忘录没有原则性的不同意见,只是希望沙台军事合作和馆舍问题不列入备忘录。此外,为了表述更明确,建议作些文字修改。双方同意指定官员修改

文本。费萨尔还建议签字仪式于22日在吉达见过国王后举行。大组会谈时，双方都充分肯定了建交的重大意义，并就今后发展双边关系交换了意见，就领导人互访、建立外交部间磋商制度、经贸混委会和开设领事馆等问题达成共识。钱其琛希望中沙关系发展成为不同社会制度、不同信仰国家之间友好合作的典范。费萨尔表示，两国信仰不同，但坚信互不干涉内政、和平共处的原则，完全可以建立典范式关系。

21日上午，我和沙外交部助理次官伊斯梅尔被指定就公报和备忘录的一些文字修改交换意见。沙方原提出两处修改，一开始，我想双方很快就会结束此事，结果却出乎预料。沙方又提出要将两份文件逐句讨论，并提出了不少文字性和技术性的意见。一上午这项工作都没有结束，下午又接着讨论。双方最后在一个问题上僵持不下：沙方坚持要求将我使馆馆员人数限制为20人。我方不同意，最后建议将此事提交两国外长商定。中午吃饭时，钱外长问我谈的时间为何如此之长？我如实汇报，并表示沙方似在有意拖延时间，外交大臣可能另有要事。



作者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国宾馆

17时半,我们终于结束对文本的修改。沙官员提出更改日程,说根据费萨尔亲王的意见,这是中国外长第一次正式访问沙特,而且要宣布两国建交这个重大历史事件,会谈、签字等正式活动都应在首都利雅得进行,签字仪式因而改到当晚双方外长会谈后举行。我们随即赶紧重新准备两份文件的三种文本。中方负责准备中、英文文本,沙方准备阿文文本。由于当时我商代处没有电脑等打印设备,只好手写文本。经过紧张的书写核对,19时准备就绪。19时半,两国外长单独会见,对文本作最后确认。这时费萨尔大臣告诉钱外长,他白天去了巴格达和科威特,调解伊科争端。我们这才明白,沙方拖延时间,日程多变,原来是忙于调解伊拉克—科威特争端。就在我们离开北京赴沙特的前夕,即18日,伊拉克总统萨达姆发表讲话,公开指责科威特破坏伊经济,使伊科关系迅速恶化。沙特和埃及一样,都在伊科之间紧张地进行调解活动。我没有想到,11天后,伊拉克竟会悍然出兵占领科威特,引发了牵动全球的海湾危机。我也没有想到,3个多月后,为了争取和平解决这次危机,我再次陪同钱外长出访沙特。这是后话。

七

21日21时40分,中沙建交签字仪式在沙特外交部会议室举行。会议室中央放着一长桌,长桌两端摆着两国的小国旗,双方有关人员站在桌子后方。后面墙上挂着沙特第一任国王沙特、现任国王法赫德和王储阿卜杜拉的大幅画像,画像两边竖立着中、沙两国国旗。两国外长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庄严地在建交公报和谅解备忘录上签字。接着钱外长举行记者招待会,向中、沙及世界各大通讯社记者介绍了有关情况。中、沙正式建交一事立即成为世界各大媒体的头条新闻。

在建交公报中,中国政府重申,“支持沙特阿拉伯王国政府奉行的旨在实行安全、稳定和维护民族利益的政策”。沙特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两国政府同意在互相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基础上发展两国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在谅解备忘录中,沙特除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外,还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



中沙两国外长签署建交公报(后排左三是作者)

的一部分。备忘录对沙特同台湾关系的性质等重大问题作了既符合中方原则、也为沙方接受的明确界定。

记者招待会结束以后,当晚22时许,钱其琛外长一行出席了东道主的欢迎宴会。晚餐很丰盛,体现了主人的热情好客。此时用餐,对阿拉伯人来说是正常的,但对中国人来说早已过了饥肠辘辘的时刻,加上连续紧张工作,我已没有饿的感觉。但想到一件大事终于做完,来沙的主要任务已完成,身心顿感轻松,就饱餐了一顿。

八

剩下的一场重要活动就是国王会见。22日13时半,钱外长一行在参观了延布港工业区后,乘沙方专机抵达沙西部重要港口城市吉达。吉达是仅次于利雅得的第二大城市,现代化建筑设施完善。它是国王的夏宫,国王和其他领导人每年差不多有一半时间在这里办公。16时,法赫德国王在王宫会见钱外长一行。王宫是座花园式建筑,环境优美。院中绿树环绕,水池升起巨大喷

泉,四溅的水星给闷热的空气注入丝丝凉意。国王年届古稀,在会客室门口迎客,同钱外长和随行人员一一握手。他讲话兴致很高,刚一见面,即滔滔不绝地谈了65分钟。他详细、全面地介绍了沙特的情况,从石油到教育、卫生;从城市建设到人民生活;从内政到外交;从第一任国王的丰功伟绩到他今天的工作,有情况、有数字,如数家珍。他没有讲稿,话题难免有些不够条理,但他对沙特的情况的确非常清楚。我注意到他讲话中的一些开明思想,如强调利用外国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重视教育和培养本国师资,强调前几任国王的功绩,没有突出自己,强调对外奉行温和政策,含蓄批评有的国家强大了就想欺侮别人。

钱其琛外长认真听完国王的讲话后,说明了来访目的,转达了杨尚昆主席对他访华的邀请。他当即表示接受。钱外长还简要介绍了中国执行改革开放政策取得的成就,表示不管别人怎么说,将坚持走这条道路。法赫德国王当即表示赞同,说应该根据国家的利益走自己的路。钱外长谈到,中沙具有不同的社会制度、信仰和文化传统,但两国关系可成为和睦共处、友好合作



沙特国王法赫德同作者握手

的典范。法赫德国王说,各国有具体情况,这是他们的内政。国家之间应该友好相处,互相尊重。他了解中国从不干涉别国内政。会晤气氛亲切融洽,历时90分钟。据说,法赫德国王如此长时间地会见外宾,还是少有的。

钱其琛外长访问沙特以后,还将访问塞浦路斯。沙方考虑到自己安排的变化有可能耽误钱其琛下一站的访问日程,特地于22日晚安排专机送我们离开吉达,赴塞浦路斯。

九

鉴于中沙建交的重大意义,我在陪同钱外长访问后的回国途中就听说,为扩大影响,介绍中沙建交及我外交胜利,李鹏总理将委托国务院秘书长罗干去机场迎接,并安排新闻记者去机场采访。7月31日,钱外长一行返回北京。罗干秘书长在机场对钱外长说,他代表李鹏总理欢迎钱外长访问归来,祝贺这次访问取得圆满成功,祝贺钱外长代表中国政府同沙特政府完成了中沙建交这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工作,祝贺中国外交取得了新的成就。

中以建交漫漫路

1992年1月24日,中国和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这个重大行动不仅结束了中以两国长达40多年没有外交关系的历史,而且使中国同中东这一敏感而重要地区的所有国家都建立了外交关系。

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和以色列就已经相互承认,两国关系经历了渐进和曲折的发展过程。从中可以看出,中以关系的冷热不是出于双方自身,双方没有任何直接利害冲突,而是出于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奉行扩张政策,中国一贯支持阿拉伯人民正义事业的立场。可以说,中以两国发展关系的历程,就是中国根据以色列对中东问题的态度和阿以关系的变化,逐步调整和完善对以政策的过程。

20世纪50年代,中以曾就建交问题进行接触。

1949年新中国宣告成立。早一年建国的以色列刚进行了第一次中东战争。以色列虽然打赢了这场战争,但仍然受到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孤立和经济封锁,处境很困难。为了摆脱困境,以色列需要拓展对外关系,需要同中国发展经贸和政治关系。以色列开国总理本·古里安认为:中国将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国家,是一个潜在大国,应与之发展友好关系。

1950年1月9日,适逢新中国诞生100天,以色列外长夏里特致电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宣布以色列“承认您的政府为中国合法政权”。这样,以色列成为继缅甸、锡兰、巴基斯坦、英国和挪威之后,第六个承认中国的非社会主义国家。

1月16日,周恩来总理回电表示感谢。

中国政府考虑到以色列已承认中国,而且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同时,同以色列开展贸易有利于打破美国的禁运,决定就建交问题同以色列进行接触。1954年周恩来访问缅甸时,会见了以色列驻缅甸公使哈科恩,邀请他访华。

但是,以色列政府内部在对华政策上存在分歧。外长——后来一度出任总理的夏里特不同意本·古里安的意见,主张应更多考虑美国的态度,“谨慎从事”。因此,以色列的态度出现了反复。

朝鲜战争爆发以后,以色列在联合国先后支持美国关于诬蔑中国为“侵略者”的提案和暂不审议中国代表权的提案。朝鲜战争结束以后,夏里特出任以色列总理,批示外交部“不能迅速”同中国建交,但可保持外交官之间的接触。

因此,1955年1月,哈科恩访华时,没有同中方讨论建交问题。双方签订的贸易关系协议书只提到,希望中国派商业代表团访问以色列。随后,哈科恩又告知中方:“在讨论建交以前,请中方派一代表团访问以色列。”显然,以色列采取拖延的态度。中方对以方的邀请没有给予回应。

1955年4月,万隆会议即将召开。以色列作为亚洲国家,被排斥在会议之外。它担心孤立,于4月29日匆忙通知中国外交部,以色列希望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但是,为时已晚。中国在万隆会议上决定站在阿拉伯国家一边,共同推动会议通过“支持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民的权利”的决议,将以色列视为反对对象。

二

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中以关系冻结。
在此期间,民族解放运动发展。中国将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民反对以色

列占领的斗争看作民族解放运动的一部分,予以坚决支持。1956年,中国支持埃及等阿拉伯国家反对英、法和以色列侵略的斗争。1967年“6·5战争”爆发后,中国谴责以色列的扩张行径,支持阿拉伯国家反对美、以侵略的斗争,支持巴勒斯坦人民重返家园的正义事业,赞赏巴勒斯坦人民以武装斗争作为争取解放的主要斗争形式。

中国国内发生“文化大革命”以后,极“左”思潮一度干扰外交工作,原已冰冷的中以关系“雪上加霜”。

以色列曾在一些场合发出同中国改善关系的信息。在联合国大会讨论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时,以色列多次对美国阻挠将中国代表权列入大会议程的提案投了弃权票。1971年10月,以色列支持联合国大会通过恢复中国合法席位、驱逐台湾代表的提案。

但是,中国当时的做法是不同以色列发生任何关系,不直接通商、通邮,对以色列政府发来的电文拒收并退回。

三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中以民间来往逐渐增加。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其间有几件大事。一件是埃及和以色列开始和谈。1977年埃及总统萨达特访问耶路撒冷,1979年埃、以签订和约,正式建交。它开始突破阿以之间长期军事对峙的局面,出现了通过政治谈判解决阿以争端的新趋向。另一件是1982年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通过决议,其中提到要求保证中东地区所有国家的和平。实际上,这就承认了以色列的存在。第三件是以色列总理佩雷斯表示,可在以土地换和平的基础上,同约旦、巴勒斯坦谈判。这是以色列总理第一次提出“以土地换和平”的谈判原则。

在此形势下,要求和平解决中东问题的呼声越来越高。阿以双方的官方人士进行着各种形式的秘密接触。以色列同非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也在发展。

中国也适时调整了对中东问题的态度,赞赏埃及同以色列建交是“勇敢行动”,强调政治谈判是解决争端的最好方式,劝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同以色列对话。